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八八三期 ——  
(二〇一三年二月二十五日出版)

---

本期目录 (zk1302c)

---

【书刊评论】	从国家政治的角度看文革	董郁玉
【百家争鸣】	再议蒯大富为何难舍“毛泽东情结”	诚言
【读书笔记】	他为什么还留恋文革?	胡平
【亡灵祭坛】	“文革”中的几件“灭门处决”案例	王锐

---

小启: 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 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 <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mailto: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mailto: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表明 CR 字样。

---

【书刊评论】

从国家政治的角度看文革

• 董郁玉 •

◇ 谁的文革?

哈佛大学教授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著的三卷本《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以下文内简称《起源》)的中译本由香港新世纪出版社出齐。中国内地出版社曾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出版了经过删节的此书第一卷和第二卷的中文译本。

这部专述文化大革命起源的通史,从文革前10年的1956年写起,到1966年文革爆发时止,分成《人民内部矛盾1956—1957年》、《大跃进1958—1960年》和《浩劫的来临1961—1966年》三卷,共计1430多页,实可谓皇皇大著。《起源》对来自官方与民间的海量历史资料条分缕析,多方考证,细致甄别,贯通因果,以至句句有根,事事有据,其旁征博引的史料之多,所述的历史事件之多,在中外文革研究领域,尚不见出其右者。

对于中文读者来说,更重要的则在于,《起源》虽以文革起源为全书叙事的脉络,但其成书

的逻辑却迥异于中共党史的逻辑，整部书都是在中共党史、或者说是在联共（布）党史的话语体系之外，从国家政治的角度契入构成文革起源的国家政治运作，把文革作为国家政治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现象进行研究，从而使人们既能身临其境去体味文革的种种细枝末节，又能与文革拉开必要的观察距离，而不至深陷构成文革起源历史中的具体是非而不可自拔。

在传统的党史话语体系中，党即是国，国即是党；党史就是国史，国史就是党史。于是，各种官定的中国国家现代史乃至近代史，其叙事结构与内容，与中共党史的历史唯物主义叙事结构及其内容毫无二致，雌雄不辨。这种国史党史同为一体的叙事结构，几无政治权力来源、国家权力合法性、政治责任和政治道德的位置，而尽是革命、路线、领袖和阶级的范式。

正是在这种范式的阐释中，在国史混同于党史的情况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是以中国的国家政治灾难和社会灾难被叙事，而是被当成了一个党在革命征途上的一次挫折被叙事。并且，这个挫折被有选择、有限制地展开叙事的目的，就是为了证明这个党因为战胜了挫折、纠正了造成挫折的错误而变得比以前更加强大。

当然，人们不能“对事实发火”。从《起源》一书中，读者可见，在1949年以后的国家政治架构和社会结构中，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场“运动”，确实把中国国家历史和中共共产党的党史从某种角度上重叠在了一起。然而，即便如此，把这些同样的事实放置于不同的叙事结构当中，其得出的结论很可能是大相径庭的。

以国家历史为叙事框架，中国共产党就是一个掌握全部国家政治权力的政治组织，文化大革命就是这个政治组织为国家制定和输出的政策及其实施的结果。而这种结果，正是中共组织内部的权力安排与分配以及政策制定与实施缺乏一定规则和程序的表现形式之一。而串联起一个政党、尤其是一个执政党与国家政治关系的主干，却正是基于其政策实施结果的相应政治责任。一个执政党的政治责任，是其执掌国家政治权力的合法性之有无以及能否存续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以中共党史为叙事框架，国家、社会、公民就很难在其中找到厕身之处，而中国共产党则在不同的执政阶段中，被分割成了代表不同“路线”的“左、中、右”派别；这些派别或又被划分成“好人”与“坏人”的不同群体。如是，在面对其对国家负有的政治责任方面，中国共产党就不再是因其掌握全部国家政治权力，而必须对国家负有全部政治责任的一个整体性的政治组织，而是由其中的“（四人）帮”、派（“改革派”或“保守派”）代表整个党，来为某个阶段的政治责任进行担当。这样，文化大革命也不再是这个政党的政策输出和权力运行的结果，而是“四人帮”、林彪等“坏人”当道、“好人”受难的结果，是“右派”不识时务、“左派”错整“右派”、“中间派”没有觉悟的一堆党内事务。

在国家政治中，一个政党作为整体的存在，是其对国家负起政治责任的基础。文化大革命成为中共党内事务，实则掏空了执政党对国家的政治责任。或者说把执政党对国家的政治责任，变成了厘清并公布谁是党内的“好人”、谁是党内的“坏人”，谁是党内的“七分好人、三分坏人”，谁是党内的不折不扣、彻彻底底的“坏人”，谁又是党内的胸怀“好心”却不得不办了错事、坏事的好人等党内是非。

如此一来，党内“好人”的受难，便可替换国家的政治灾难；党内“坏人”的罪错或某个派别对党负有的党内责任，亦可顶替整个党对国家负有的全部政治责任。在这样的叙事逻辑中，依党内是非而划定的“好人”与“坏人”，不是构成党的整体的不同部分，而是“好人”代表党，“坏人”——通过把他们开除出党——则似乎成了与党组织无关的一部分人，由此便可摆脱这些“坏人”施政而带来的整个政党对国家应负的政治责任。也因此，党内的“坏人”不仅仅是

党的敌人，也被用来充当国家的“公敌”。

从国家政治角度来观照政党与国家的关系，一个政党，能否“摆平”其内部的“坏人”，以便生产出国家而言的“好政策”，那是政党的内部事务。一个政党，其在政策制定与输出上，是被作为一个政治组织的整体来看待的。这就是说，如果执政党向国家政治系统输出了“好政策”，那么，从党外的角度看，这不会被认为是这个党内的“好人”制定的政策；反之，如果执政党向国家政治系统输出了“坏政策”，那么，站在国家政治的角度，这同样也不会被认为是这个党内的“坏人”制定的政策。

因此，一个政党，不论依据什么样的党内标准划分出政党内部的“好人”与“坏人”，这些人都代表整个政党在制定和实施政策。因此，这个党也必须为这些政策的后果，以及这些政策制定者和实施者的政治行为负起政治责任，而不论这些政策的“好”“坏”，以及这些政策制定者和实施者是“好人”还是“坏人”。

麦克法夸尔《起源》的最大叙事特点，就是没有在中共党内划分出“好人”与“坏人”，进而再以“好人”和“坏人”之分，来诠释他们所主张的政策“好”“坏”；或者反之，依其所主张的政策“好”“坏”，有倾向性地把一些人定位于“好人”，把另外一些人定性为“坏人”。没有“好人”“坏人”，当然也就没有国家政治责任的党内替罪者。在党史叙事中的中共党内的“好人”与“坏人”，在麦克法夸尔的《起源》中，都是中共党的一分子；就大的政治目标而言，他们都是为中共党的执政利益而怀相同的政治理想、存相同的政治动机、有相同的政治目的的“同志”。这种不分“好”“坏”的客观叙事，最大限度地还原了文化大革命起源的历史过程。

#### ◇ 谁的政策？

国家政治，从某种角度简言之，就是一些公共政策的制定以及实施过程。在中国政治制度的背景下，这些政策来自掌握了国家政治权力的执政党。在一党执政的政治体制下，政策的制定虽无政党之间竞争与博弈的过程，但是，政治权力所具有的天然竞争性，仍会在一个政党内部的政策制定过程中体现出来。

从一定意义上讲，国家政治的过程，是围绕政治权力而展开的。一项公共政策，其在实际中发生的效果，总是会强化或削弱政策制定者与实施者的政治威信，从而强化或削弱他们的政治地位，进而强化或削弱他们在党内的政治权力。这就是党内政治斗争的动力所在，也是所有权力斗争发生的重要因由（参见《浩劫的来临 1961—1966 年》第 451—449 页）。因此，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正是麦克法夸尔契入文革起源之处。

由此，《起源》把文革缘起的研究范围扩展至 1956 年，也正是因为中共在这个时期的政策，开始在实践中引发一些灾难性的后果，并由于党内权力结构和政治制度的限制而难以被纠正，以此为文革的爆发累积了政治能量。麦克法夸尔注意到，“1956 年发生了两个关键性的事件——中国合作化的完成和苏共二十大的召开——它们随后引发了一连串的事件，最终明显地，也许是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生”（《人民内部矛盾 1956—1957 年》第 15 页）。

以战争的暴力方式取得政权，会难以避免地给政治权力的行使带来影响。这也是绝大多数“革命党”止步在“夺取权力”与“赢得权力”之间的鸿沟前，不能成功地过渡至“建设党”的基本原因。现在看来，在和平建设时期，以战争年代那种命令方式来操控权力，并且还能取得“成就”，这就会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对政治权力的行使产生更大的误导。以暴力革命“夺取权力”，靠的是枪杆子；以和平建设“赢得权力”，靠的是公共政策。

毛泽东在1955年7月31日的一个报告中，对那些在农村合作化运动中持谨慎态度的官员进行了嘲笑，说他们“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当然，可能连毛泽东自己都没有想到，压指标、下命令的军事指挥方式在和平时期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农业合作化只用了4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这个速度，让毛泽东自己规定的14个月的时间都相形显得过分保守了。几亿农民世代延续的生产方式，在短短4个月的时间里被彻底改变。正是这个“伟大的成就”，空前膨胀了毛泽东的意志。也正是在1956年底，他信心满满地宣布：“这一年过去，社会主义的胜利就有很大的把握了。（本段引文均见《人民内部矛盾1956—1957年》第21页）”

但是，一项公共政策的实施，不似一项军事命令的执行那样可以迅速见分晓。农业合作化在4个月之内被迅速完成了。然而，这个政策的实施速度，加倍放大了其存在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又不能像打扫战场那样，在短时间内被打扫干净。为此，政策实施者就必须采取其他相应的补救措施来为这个政策善后，并由此产生分歧。这种对政策及其实施的分歧，就是党内政治权力斗争的起源。

当然，在毛泽东一言九鼎的中共党内权力格局中，身处“一线”的政策实施者与置身“二线”的政策设计者毛泽东在政策上的分歧，只能以政策实施者向毛泽东低头检讨而消弭。然而，所有政策参与者都清楚，在政策实施的实际效果面前，失去更多政治威望的不是检讨者，而恰是毛泽东本人。由此造成的对失去政治权力的焦虑而堆积于胸的块垒，直至10年后的1966年，才被毛泽东一吐为快（参见《浩劫的来临1961—1966年》第452—453页）。

《起源》以中共党的政策制定和实施为经，以中共党内政策参与者围绕政策制定和实施而展开的权力斗争为纬，为文革起源串通起了因果链条。并且，《起源》也常常以寥寥数笔来交代中共在其历史上党内权力斗争的脉络，以为读者建立起相关的阅读背景。

毛泽东亲自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重要目的之一，无疑就是要铲除“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除掉那个在政策制定与实施上有自己的一套，并总是以检讨的姿态来蚕食自己政治地位的刘少奇（参见《浩劫的来临1961—1966年》第453页）。不过，正如《起源》所述，从中共党内权力派系的渊源上讲，刘少奇应为毛泽东最亲密的战友之一。刘少奇堪称是毛泽东在中共党内如日中天地位的最力建造者。如果没有刘少奇在延安整风时不遗余力的帮衬，没有刘少奇在中共七大政治报告中提出“毛泽东思想”这一具有超越性的意识形态主导思想，以及其他无数任劳任怨、鞍前马后的铺路和善后，毛泽东在党内说一不二的威望，就不会在曾经“山头”林立的中共党内如此快和如此牢固地建立起来（参见《人民内部矛盾1956—1957年》第11—13页，第108—110页；《大跃进1958—1960年》第153—171页，第218页）。

经过合作化、工商业改造和大跃进，毛泽东在党内的政治威望和实际地位受到了削弱。以毛泽东对权力的敏感性，他对此当然心知肚明。毛泽东力推的许多政策，在实际中引发了大量问题，“甚至在中共的最高领导层，对这些问题仍然存在实质性的不同意见，自那以后，这些不同意见持续了很长时间并日趋严重，也正是在这些不同意见中埋下了文化大革命的许多种子”（《人民内部矛盾1956—1957年》第105页）。

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在党内独断暴行的揭露，以及在中共八大通过的新党章中“删节了两处涉及‘毛泽东思想’的部分”（参见《人民内部矛盾1956—1957年》第106页，《大跃进1958—1960年》第300页），都强化了毛泽东对失去党内政治权力的担忧。没过多久，提议删去这两个部分的彭德怀就在次年的党内政策之争中被剥夺了全部政治权力。而1

0 年之后的文化大革命更证实了这个“君子之仇”有多深：早已经是“死老虎”的彭德怀又被揪了出来，就此事反复写出交代材料；而“同意”删去这两个部分的刘少奇和其他人，都在文革中为此付出了大小不等的代价（参见《人民内部矛盾 1956—1957 年》第 106—108 页）。

苏共与中共的同构性，宿命般地决定了其最高领导人在党内取得、保有和捍卫权力的方式。并且，这种方式的形成，也绝非是党的最高领导人一人之功。即使从以党史话语体系精心构造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看，苏东等各个国家的所有共产党组织，虽经过频繁的党内权力斗争，但却都没有形成符合一般政治伦理的制度化的党内权力规则；党的领袖及其同志，都认可、服膺甚至舍身维护这种比宫廷政治还要晦暗和残酷的“山寨规则”。

问题在于，在没有掌握国家权力之时，围绕党的政治权力之争，不论多么残酷，多么背离常规的政治伦理，其影响所及，还基本限制在政党组织的范围内。而在这样的政党“夺取”了国家权力成为执政党，并且是在没有其他竞争执政的政党存在的情况下，其党内权力斗争的方式及其后果，就会对整个国家产生深重的影响。这种党内权力斗争的方式演绎到极致，就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不论从世界各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史，还是从整个人类的政治发展史看，以动员全社会的方式来进行一个党的内部权力斗争，且在以此对整个国家的政治权力做出颠覆性改变的同时，还能保有整个党的执政权，这样党内权力斗争方式确是一个政治行动的创举。这也许就是麦克法夸尔所谓：“从来没有一个独裁者，发动社会力量反对他自己所创建的国家。这次确乎是所有群众运动之母。（《浩劫的来临 1961—1966 年》第 445 页）”

#### ◇ 谁的责任？

实际上，毛泽东敢于如此所为的独特优势，就在于由刘少奇最先擎起的“毛泽东思想”这面大旗。

上述共产党在进行内部的权力斗争时，没有公开的、制度化的既定政治程序。但是，这并不等于说共产党内部的权力斗争毫无遵循。从各国共产党内部权力斗争的历史看，在党内权力斗争中的胜出者，无不是其意识形态的忠实体现者。

而正是意识形态的至高无上性，为那些按照一般政治伦理标准衡量过于残酷的党内权力斗争方式，提供了合理性以及正当性的支持。权力斗争的胜者，一定要申明其拥护、遵循和代表那个支撑党的意识形态；权力斗争的失败者，也一定被冠以反对、违背和篡改了党的意识形态。因此，党的意识形态，是党的政治权力正统性的根据所在。在苏共二十大上，“在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之前，出席会议的大会代表都得到了列宁在 1922 年 12 月写下的‘遗嘱’的文本，列宁在这个‘遗嘱’里对斯大林作了严厉的批评；还有一份写于 1923 年 1 月的提议撤销斯大林的总书记职务的附录”（《人民内部矛盾 1956—1957 年》第 45—46 页）。由此可见，在共产党内部，如果要剥夺一个人的政治权力，甚或要否定一个人的政治遗产和历史地位，那么，都必须将其与党的意识形态强行剥离。把列宁“遗嘱”下发至苏共二十大代表，就是想证明斯大林绝非列宁主义的合格信徒和忠实执行者。

被各国共产党公认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鼻祖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掌握共产主义运动组织中的实体性政治权力。列宁的早逝，也让列宁主义附体于列宁之身的时间十分短暂。而实际上，真正规范了列宁主义范畴、对列宁主义做出最“权威”的解释，却正是由斯大林在列宁死后做出的。因此，列宁在党内所掌握的实体性政治权力，也没有与以其名字命名的“主义”

过紧地粘连在一起。

至1945年，刘少奇在中共七大政治报告中提出了“毛泽东思想”以后，共产党内部的实体性政治权力与共产党的意识形态的结合就具备了现实而坚实的基础。以掌握党的最高政治权力的人的名字，来命名党的正统意识形态，这就在赋予了这个人的言说以至高无上性的同时，又赋予了其手中的政治权力以意识形态价值的超越性。如此，把党的意识形态附体于个人，某种程度而言，就等于把这个人化身为了党的意识形态。正如上述，马克思和列宁都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待遇”（参见《浩劫的来临1961—1966年》第314—322页，第448—449页）。

正是这样的“附体”，让毛泽东在党内的政治地位具有了“神性”。这个“神性”就体现在毛泽东的言说、政策设计、权力与党的意识形态的紧密结合上。而1945年之后中共所取得的一系列革命成就，不过都是这个“神性”的证明而已。

问题也正在这里。如果共产党的事业一帆风顺，那么，不会有人去怀疑这个神祇的灵性。但是，当党的最高领导人设计、制定的政策在实际中遭遇失败时，让其去承担因此而产生的政治责任，这就不啻让那个在祈祷中丧失了保佑灵性的神祇去担当凡间的具体罪错。在这样的政治架构中，反对毛泽东制定的政策，反对毛泽东，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党的指导思想，反对党的意识形态，反对党，反革命……就都成了一回事。由此，在党内政治权力斗争中，“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为毛泽东奠定了不败的基础（参见《大跃进1958—1960年》第299—302页，《浩劫的来临1961—1966年》第171—181页）。

毛泽东作为“毛泽东思想”这个党的意识形态化身地位的确立，为毛泽东的政策设计赋予了天然的政治正确性和不可置疑性。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正是提出“毛泽东思想”的刘少奇，成了其所打造的这个政治神祇的最大祭品。这也正是麦克法夸尔的不解之处：“刘几乎肯定从未想到过任何政变，但他却未作任何抵抗，这确实是很奇特的。相反地，他1966年5月顺从地主持了打倒他的主要政治盟友的会议。（《浩劫的来临1961—1966年》第451页）”

当然，在这样的政治架构中，对毛泽东那些在国家政治实践中已然遭遇到多重失败的种种政策感到无能为力的，还不止是刘少奇。在党的意识形态附于毛泽东之身时，那些曾亲眼见证过神祇灵性的同志们，看着“这位带领他们从漫长的革命征途走向胜利的人，现在又以某种捷径，带领他们向乌托邦发起了冲刺”的时候，“谁会去提醒作为神的毛说，大自然可以驯服，却不可被践踏；人们可以移山，却不能创造奇迹；政治革命可以在十年或者甚至一天里成功，但思想革命却需要几个世纪”（《大跃进1958—1960年》第314页）？

正是这样的“人神”一体，使毛泽东具有了党内其他任何人所不可能具有的政治优势。这种政治优势，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本钱。毛泽东是“毛泽东思想”的化身，“毛泽东思想”是中共党的指导思想，因此，毛泽东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化身。这个政治现实，正是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几近彻底颠覆了党的组织结构，但却能给除他自己以外的所有人扣上“分裂党”的帽子，以一人之身凌驾全党之上的根本原因。

这样的现实，也是中共在日后整理文革瓦砾之时，颇有投鼠忌器之感，难以将毛泽东与作为中共指导思想的“毛泽东思想”彻底剥离，并且要“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以及对过去的事情“宜粗不宜细”（引文均见《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根源。

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科学地论述了毛泽

东思想的基本内容”，把“毛泽东思想”定性为“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提出要“全面、准确理解毛泽东思想”；还为之确立了“实践检验”的标准；且用“发展”的限制性定语，为“毛泽东思想”的具体内容在今后可能出现的变动留下了通路。

不过，总体来看，只要“毛泽东思想”存在，毛泽东与“毛泽东思想”，就确实具有不可分性。在此，《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及中共以往采取的政策措施，也并未要改变党的指导思想以个人名字命名的现象。客观而言，党的意识形态、党的政治权力与党的领导人在某种程度上的“合体”，可以提高党的最高领导人的政治地位，增加党的领导人的正统性和高层政治权力的稳定性。这也是毛泽东之后中共党的最高领导人需要提出自己独特的意识形态观念及其理论，并将其纳入至党章的基本动机。

更重要的还在于，保证毛泽东政治地位的正统性，是保证中共在国家政治中的合法性的需要。文革的灾难由“四人帮”、“林彪反党集团”造成，以及“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些举措，一方面使毛泽东脱身于国家政治责任，另一方面也保证了中共在国家政治中的合法执政地位。

中共执政地位的确保，需要作为其指导思想的“毛泽东思想”；而“毛泽东思想”的存续，又需要确保毛泽东的历史地位；要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就必须对过去的事情“宜粗不宜细”；“宜粗不宜细”，才有当下中国大陆文革历史研究的冷清局面……然而，也正是在这样环环相扣的制约和限制中，党对国家应负的政治责任，文化大革命给国家造成的灾难，都始终没有得到细致言说的机会。也正是由于意识形态正统性的缘故，在今日中国，在相当多的人的想象中，文革竟然有了玫瑰色调的魔幻色彩，由此，也才会公然出现“重庆模式”下的政治实践。

“毛泽东思想”让毛泽东仍旧站在中共历史的制高点上。这，也许正应了那句证明毛泽东身在神坛的口号：“毛主席万岁！”而以文化大革命爆发为止点的《起源》，也正是用“毛主席万岁”这句耐人寻味的“最高指示”，结束了这三部探讨文革发生起源的皇皇大著（《浩劫的来临 1961—1966年》第454页）。

□ 原载《炎黄春秋》2013年第二期

~~~~~

## 【百家争鸣】

### 再议蒯大富为何难舍“毛泽东情结”

• 诚 言 •

在本文的前一部分（见“蒯大富为何难舍‘毛泽东情结’？”，载本刊zk1108d），笔者从蒯大富对毛泽东发动文革动机的误判、对毛“民族英雄”的错定、对毛“关心弱势群体”的臆想等三个方面，剖析了他的“毛泽东情结”在常人看来是多么荒诞和不可理喻。尽管我不同意他的基本判断，但我还是要说，由于每个人的经历不一样，所处的社会环境、经济利益、掌握信息及认识水平均有差异，善意地宽容地为老蒯着想，他有这种“情结”也不足为奇。请注意，我这里没说他与我“政治立场不同”。为什么？因为在我看来，他不同于文革遗老张宏良，不同于出卖良知的网评员，不同于贪图蝇头小利的“五毛党”，也不同于文革时宋彬彬谭力夫之类的“官二代”和现在拉“唱红”作虎皮的“红二代”。他不是一个在“政治立场正确”的掩饰下“假装睡着的人”，他仅仅是一时迷糊而已。

那么，老蒯同志是怎样陷入这个认识误区的呢？作为一个同龄人，作为一个清醒得早一点

的“红卫兵”，我不妨沿着他的人生轨迹，分析原因有：

## 一、青少年时代接受的教育和训练夯实了他“毛情结”的基础。

蒯大富生于1945年。他坦言他家原本是殷实之家，由于爷爷赌光了田地，土改时有幸划为贫农。他刚刚懂事，眼睛看到的就是农村土地改革后农民兴奋的面孔、墙上“土地回了家，农民笑哈哈”的大字标语及门前“翻身不忘毛主席，幸福全靠共产党”的鲜红对联，稚嫩的童声很快就学会唱“他是人民大救星”、“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课本中“吃水不忘挖井人”的感人故事，农民踊跃交公粮时“前队刚过翻身桥，后队还在幸福塘”的美好意境，水银泻地般的革命道理，犹如潮水从四面八方涌来，让他从感性到理性，自然而然地、有骨头有肉地把领袖与农民、恩情与幸福、理想与使命交集在一起，浇铸了认识社会解释社会的第一块思想基石。这个基础工程教育，大富不可能拒绝，我当时也被顺利施工。及长，农民土地所有权虽然得而复失，但由于“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了“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温水煮青蛙的过程相当温柔，也相当顺利。连大人们都用红纸写着申请书、喜报、一路敲锣打鼓向“社会主义阳光大道”“通向共产主义天堂的金桥”奔跑而去哩，少年的蒯大富同学会想到有人“夺”了农民“命根子”、谁谁“出尔反尔”？虽说以后又出现了大炼钢铁损失巨大、粮食减产饿死几千万农民的悲剧，但哪哪是人民群众意气风发、敢想敢干必交的“学费”，哪哪是苏联逼债、自然灾害造成的“恶果”的巧言令色，一定会使他更加信服伟大领袖的英明领导。在当时有声有色的忆苦思甜会、斗“五类分子”会、吃忆苦饭、政治学习、形势教育、写思想汇报、大唱革命歌曲等等卓有成效的传统教育活动中，蒯大富同学对伟大领袖“朴素的感情”，一定会进一步升华，上升为紧跟领袖干革命的高度政治觉悟。在高中他加入共青团，他认为取得了以后入党的资格。完成这个从只怀有“朴素的感情”到具有无比相信领袖的“政治觉悟”的飞跃，估计是在高中阶段。

由于这个思想基础太为牢固，出于对工农劳动大众热爱和同情的天性，他会为今天正式工人无端失业或农民工劳动时间长、工资低、讨要工资难的窘境而气愤，但不会去认真追寻昨天已注定工人今日宿命的成因；他会为“农民工”一年到头四处奔波、春节回家一票难求的状况而难过，但不会去探究当初对农民的人身限制对不对、农民为什么不能安心务农或定居城市？他会为一桩桩具体的强拆、征地事件不合理而鸣不平，但不会整体思考农民土地、城市人房地地的天然所有权是何时丢掉的。老蒯为弱势群体说话固然难得，但一旦把“一颗红心”押给了强势偶像，为弱势者说的话必然词不达意，自信此时在为民请命，却往往错会了草根们的真实意愿。

## 二、路线斗争教育激发他投入文化大革命的激情。

1963年，蒯大富考上了大学。我注意到他这样介绍他能从一个农村普通中学考入全国一流大学的细节：除了自己努力外，还有几个高水平的被贬右派老师教他们，他的七个老师，有四人都是右派。比如他的化学老师就是从南京下来的被贬右派，所以蒯的化学成绩特好，得以考上清华化学系。对老师他至今都很感激，也感到幸运。可怕的是，他会不会由感到“幸运”，进而产生“幸亏他们打成右派，不然咋会弄到乡下来”的念头，因此少了几分对右派的同情，少了对反右的困惑和对江湖险恶的警惕？在蒯大富的回忆中，的确见不到有对包括反右在内的过往整人运动的反思和谴责。须知，我还在读初一的时候，我的一个同学就恨恨地用“套猫子的”几个字，表达了他对那场运动的领悟和鄙视。与同龄人相比，蒯大富对神只会仰望，政治智商并不算高。

如果说中学阶段他已具备了应有的热爱领袖的阶级觉悟，那么在大学头几年，生活又教给了他以后跟着领袖大搞路线斗争的顶尖神功。此时，前几年暗流涌动的中苏摩擦已经激化为一



场波澜壮阔却又无事生非的反对苏联现代修正主义集团的公开斗争。一篇接一篇壮怀激烈的反修檄文，除了让这个自认为根红苗壮的接班人血脉贲张、豪气干云外，更使他对领袖“以大无畏的无产阶级英雄气概拨正了世界革命航向”的历史功绩崇拜得五体投地。表现之一就是他自己述中所说这时的文章和行动就被同学们认为“有点左”。此时国内轰轰烈烈开展的“四清”“社教”运动已初步显示出最高领袖将把斗争的重点从阶级领域向路线战场进行战略转移的动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新概念频频进入主流话语，一场新的更大规模的更加艰巨的路线斗争正在最高统帅的筹划之中。为了练兵，以后将充当文革主力的大专院校革命师生轮流被派下去参加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场文革正赛的“季前赛”。想必六三级的蒯同学也有可能以“工作队员”的身份接受了这次洗礼，还进一步提高了路线斗争的觉悟和水平。唐诗载没受过亏待的白头宫女只是“闲坐说玄宗”，而在二十一世纪，我们的白头老汉却能不计领袖宣布他“已经走向了反面”、从而给人以口实被打成“坏头头”的前嫌，仍用无怨无悔的原声版讴歌领袖“敢和苏联人斗”的“反修”气魄和“反修”壮举。这表明，在文革前夜，“路线斗争”的理论真地如官方要求的那样，溶化到他的血液中去。只待伟大领袖发动文革的号角吹响，蒯大富就能以饱满的政治热情“拿起笔，作刀枪”了。虽然蒯大富貌似亢奋地进入了临战状态，但“修”的内涵、“走资派”的实质、他们是不是应当批臭打倒这一系列问题，他不会去思考，他仅仅是人云亦云。他像几乎所有的中国人一样，以领袖的是非为是非，以致今天也难以自拔，仍用陈腐的语言充分评价当年的反修运动，仍把当年被冲击的当权派视作“修”和“资本主义势力”的代表。

### 三、“文革”中的大起大落并未使他摆脱对伟人的迷信。

照说象蒯大富这种根红苗壮的左派，文革初期一般是保校党委的。由于北大工作组按中央一线领导要求强调领导、调秩序，只把矛头对准反动学术权威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与毛泽东尊重群众首创精神、走资派是重点、核心是夺权等等思想产生了矛盾。于是，蒯大富发出“工作组向何处去？”的质问。在反工作组就是反党的惯性思维下，工作组自然会按照“在大中学生中有百分之一的反革命”的指示精神，理所当然地把他打成“反革命”。在当时，象蒯大富这样因怀疑校党委、反对工作组当上“反革命”的相对较多。也有另一类情况，工作组进校后秉承上级组织或省委、或中央局的旨意，把校长、党委书记马上揪出来，而引起学生不满，出头的学生为保护校领导也被打成“反革命”。像文革初期重庆大学、武汉大学等30多个大学校长自杀（或逼死）、南京大学匡亚明、北京大学陆平等众多的校长受迫害就属于这种情况。但无论哪一种类型，这些因反工作组而成了“反革命”的及受牵连的师生后来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大多数都参加了造反派。现在有人动辄把“踢开党委闹革命”、斗校长、批教授、打老师的帐都算在“狭义造反派”身上，或者笼统归罪于“红卫兵”，严重歪曲了历史。象指挥打死校长打残老师又被主席接见的宋彬彬及拼命鼓吹“血统论”导致大批出身不好的老师、学生、工人、市民、农民挨打受害的谭力夫，什么时候当过通常意义上的“造反派”？他们的所作所为，不正是血统论当红之际么？就是写出三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掀起抄家打人红色恐怖狂潮的那一伙中学生，尽管受到伟大领袖的表扬，以后也没有参加过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崛起的“造反派”，也只能算“保守派”。未经过文革的不知情者瞎言乱语尚可原宥，亲历者为何要颠三倒四？国情的诡异，实非三言两语所能说清。

当了20多天“反革命”、受够了屈辱和恐惧的蒯大富被“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司令部”“解放”后，自然会死心塌地忠心耿耿地“毛主席指向哪，我就打向哪”，自然会凶狠地对整过他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及其代表人物王光美刘少奇进行反攻和清算。由于功勋卓著，清华“井冈山兵团”被旗手赞为“御林军”，蒯司令被总舵手封为“学生领袖”，成为清华大学一把手和市革委会常委。但是，步入人生辉煌顶点的蒯大富未及细想，与他素无恩怨的刘少奇夫妇为什么要恨他整他？与他一面不识的那俩口子又为什么要救他宠他？

坦率地说，这个问题我当时就想过了。我们学校运动一开始就是省委主要领导“抓的点”。工作组把“四清”时就失踪了的前校长（这位领导在文革后也平反昭雪）和两只“死老虎”拼凑成“三家村”去冒功，对现任领导基本未触动，重点是批教授、讲师及学生中的反动权威、小三家村、资产阶级及修正主义。这也引起了一部分先知先觉者的不满，于是派出代表去省委汇报、请愿。最后不少人被工作组及省委打成“右派”，大批群众被迫检查。一干部子弟在全校批斗会上大骂这些“狗崽子”“乌龟王八蛋”想“夺权”想“变天”，要篡夺他的父辈们开创的“红色江山”，必须坚决镇压！笔者当时19岁，无力先知先觉，先是敬佩后是同情这些右派师生，及至参加毛泽东的第三次接见后，义无反顾地当上了造反派。但我当时只恨工作组，只恨省委，对刘少奇恨不起来。为什么？因为当时指责刘少奇搞的“三自一包”“三和一少”我暗自赞同，长期流布的“三天不学习，赶不上刘少奇”的伟人话语对我也有影响。一个相处多年、且睡在身边的坏人，那么英明的领袖怎么会看不透呢？从逻辑推理上也讲不通。甚至，我想到了“套猫子的”这一说法。一个故意躲在外地，隔岸观火；一个不明就里，匆忙应付；不派工作组，你是放弃党的领导，无视党的传统工作方法；派了工作组，你必然会维稳，“镇压”革命群众运动；你只整当权派，会说你放纵牛鬼蛇神；你把矛头对准群众，则搞错了大方向。刘少奇这个“老革命”，怎么做都要遇到“新问题”了。所以在蒯大富们的助威下毛拼凑多数开了那个板倒刘邓的“全会”后，我仍给远方的亲人写信诉说见到毛林刘周朱邓的喜悦以至引起亲人担心。所以在读《井冈山》战报登出“智擒王光美”的长篇通讯时，我马上产生不该拿小孩做“人质”的逆反心理。所以在中央1968年初又端出杨、余、傅后，我校不少人产生了厌战情绪。所以在蒯大富们激昂地“用鲜血和生命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之际，我校造反派整体顺应毛的战略布署，无奈又平静地接受了“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回过头来看，毛江之所以当初要救蒯捧蒯宠蒯，不过是战术需要，不过是先制造打磨马上要得心应手使用的工具啊！可惜蒯氏至今还不开窍，仍在一往情深地“忆往昔，峥嵘岁月稠”。

对毛泽东召见“五大学生领袖”的八·二八讲话后陷入谷底的厄运，蒯大富当初认为是“杨余傅黑党”的陷害或至多是迟群吴德制造的误会、才导致领袖生气、下面人整的，事隔8年毛泽东逝世后他还认为可以救他的人走了，出狱多年仍认为文革是个不成功的反腐反修“实验过程”。这种自作多情的单相思至老不悔，只能说明他很傻很天真！其实，他“回忆录”的字里行间就提供了不少线索，只可惜他没有足够的智慧去破释。比如，他哭诉诬陷他的工宣队幕后有黑手时，毛泽东当即气壮如牛地告诉他“我就是黑手！”比如，他被关进学习班挨整时向毛江写了很多“呼救信”，一直没有人回应；比如，他指证毛泽东在武汉“七·二〇”事件后十分生气沿途讲话，实际上推动了乱军及两派的武斗；比如，他痛感抓五·一六及全国的造反派，事后证明全是假的，包括不乱军、武斗的造反派也被打下去了；比如，他的“毛的真理是对别人的，而不是对自己的”“我们也感到很恐惧”的感悟；比如，“毛主席最信任江青”、“江青执行的都是毛泽东的那些东西”的直观，以及肯定“最后毛泽东想把江山传给江青，不想传给华国锋”“绝不是空穴来风”的“说法”等等，都表明他快捅破那层窗户纸了。只是在涉及自己时，出现了“当局者迷”的现象。借用一句老话形容老蒯：被人卖了，还帮人家数钱。只是这个数钱的时间太长了！

#### 四、信息封闭、思维迟钝是蒯大富仍比较暗昧的原因。

蒯大富1973年就失去了自由，所以他没有机会看到普通群众和最高领袖随后在时兴的“开后门”这个大是大非问题上观点如何尖锐对立，没有看到“四·五”运动中汹涌澎湃的反抗文革毛派的怒潮，没法体会“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时民心更加沉重的失落，没能投身“中国的十月”万民“解放了”的狂欢，没有参加以推翻“两个凡是”为主旨的真理标准讨论，无法及时分享“五类分子”摘帽、冤假错案平反、农民土地承包的喜悦，无法及时领会中央第二个《历史决议》对毛、刘、江、林和前三十年一系列运动的最新定论。这个缓缓进展的但又势不可挡地把“神”还原为“人”的过程，亲身经历和道听途说的感受大不一样，逐步消化逐步

理解与囫圇吞枣照单全收的效果也不尽相同。蒯大富关了十七年，怎么能及时全部扫除长期形成的“神”的影子呢？

另一方面，由于现实利害的政治经济关系，对毛泽东的全面评价和对文革的研究一直无法深入，成为新的禁区，许多新的史料无法进入公众视野。依蒯大富对韩战越战的认识水平，我肯定他没阅读过关于两战全过程的档案资料。他对毛没救他的困惑至今不解，也与没弄清毛怎样修理A B团、五七右派、他的那么多战友、部下、同盟者有关，我甚至怀疑他是否听过兔死狗烹的故事。中国有句民谚：不看人对我，只看人对人。如果蒯大富更多地了解了毛的人际关系，绝不会再抱有“毛主席救我”的迷梦。事实上一直到毛“走”，蒯还被囚禁着。如果不是按照法律明确判刑，依毛对待政治犯的手段，蒯大富不一定能再获自由。

阅历有限也影响了他的信息采集，比如他对革命、优越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民主、监督、阶级等概念的理解，完全来自一边倒的说教，没有机会与国际主流社会照观，难免偏执。象老革命王震开放初期访问了英国，就赞叹不已，说只要加上共产党领导就是我们奋斗的共产主义了。颇负骂名的袁木在那场风波后到了一趟欧洲，回来后一口气连讲三个人家政治如何民主、官员如何廉政、社会如何公义的故事，一改当日训斥学生的口气，连我也对他刮目相看。老蒯和我一样没长过洋见识，连港澳台也难得一去，如再减少了阅读，岂不更加愚昧？

蒯大富的“毛泽东情结”的确达到了柯庆施提倡又得到毛本人鼓励的“相信毛主席要达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目的程度”的至上至纯境界，以至于丢失了自己应有的思维能力。比如，他总以根子红为傲。试问，你爷爷当年赌博好呢还是勤劳本份好呢？万一勤劳本份解放后你家划为地主，你爷爷父亲是否就该被打倒？你是否就该划为“黑五类”？这种划分阶级的方法是否科学？在这个基础上建立的理论能否推动社会文明进步？比如，你一直用当年的标准奢谈反对“苏修”，其实，斯大林的专制就那么得推崇？“武装输出革命”就那么值得坚持？“和平共处、竞赛、过渡”就那么值得痛恨？“反帝反修”给我们长了什么“志气”？既然我们当年信誓旦旦“打倒苏修”，在苏修真的瓦解后，当年的“反修英雄”们为什么又如丧考妣呢？我们花了那么大的代价去援朝、援越、援阿尔巴尼亚、援那么多人平收入比我们高的国家，是谁给中国人民下达如此繁重的“国际主义义务”？这对饥肠漉漉的中国人民公平吗？你至今念念不忘“文革大民主能反腐败”，试想，在绝对权力控制的社会，正常民主就十分稀缺，何来“大民主”？有了政治清明的体制，又何必大民主？那些官员一边大声唱红，一边高调反腐，一边歪曲民主，一边宣扬“爱国”，但就是钱往美国存，子女往西方送。这是为什么？为什么？文革对我们这代人创痛巨大，至今裂痕犹存。我们能否从起点追问：学生应不应该作为党派政治斗争的工具？文革本身应不应当开展？……大富同志“回忆录”涉及很多人们关心的话题，遗憾的是，由于填鸭式的灌输向来不容置疑，他也就未能给自己留下独立思考的空间，以致结论漏洞百出。

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蒯大富的经历是我们这代人的共同经历，蒯大富的悲剧是我辈人都有可能遇到的“政治陷阱”，而他的认识只代表我们中的最低（或次低）水平而已。

在某种程度上还可以说，只要仍然袭用毛泽东留下的政治体制，名改实不变的“文革”永远不会避免，蒯大富式的人生悲剧就还会出现，换个新崇拜偶像的“情结”仍会大行其道。

## 五、为蒯大富同志说句话。

在本文第一部分出笼后，受到了不少读者的评论。基本观点是赞同文中对蒯氏“毛情结”的批评，这使我感到无限欣慰。由于怕文章太长引起读者阅读疲劳，没有在“如何”二字上做解析，以至影响到读者对蒯大富的动机和人品的看法。这些看法有的正合我意，有的我有再商

权的必要。有个跟贴写道：蒯“没有接受现代民主思想教育，在监狱里坐了这么多年，少不了奴化教育却多不了西方民主思想教育。”此话甚是。外面的人尚且难有这份幸运，遑论里面的人？有个贴子说蒯“仍以个人恩怨划线”“感觉到自己是毛磨房里的一头驴，用完是要宰杀的”评判，也很老道，这里就不一一细说了。

值得商榷的有以下几点：

一是蒯大富不能算毛的“贴心太监”。他一开始就是毛的工具，没有蒯大富，毛会制造张大富李天富为倒刘发力。君不见文革初，毛为了在乱中取胜，不正是利用宋彬彬谭立夫这一批“官二代”把天下搅乱的吗？此时，这些八旗子弟的父亲说不定已被最高统帅划入射击圈了呢！一路打，一路检，用过了，就甩掉，这是一个最无信用最无人道的用人术，他怎会让蒯“贴心”呢？蒯大富的“情结”里包含有对毛看不透的成分，王光美则是看得透，但出于团队利益和家庭利益的考虑，出于“党性”，她非要维护这个虚拟的形象不可，这是二者的根本区别。

二是蒯大富也不会为文革翻案。且不说他也是文革的受害者，且不说他在回忆中客观地反映了最高策划者的鲜为人知的一面（认识是不是到位是另一回事），且不说他对自己的错罪做了忏悔也付出了代价，从文革的趋向看，他难道会认为文革真对人民、对自己有啥好处？他对文革“下面是极端的大民主，上层却是极端的集权专制”“那时的群众专政完全是暴民专政，是完全不讲理的”“共产党不讲法，制定法律的都违法”“他让你反谁，你反就可以”等等的记述，都是十分清醒的。我认为他只是感到有些委屈：我是按领袖的指示办的，凭什么说我是“反革命”？这种情绪，跟不少人“集团成员都抓了判了，团长为何还高高在上？”的疑问异曲同工，甚至与江青落水后的叫屈相似。只不过一个是正问，一个是逆问，角度不同而已。

三是从现有资料看不出蒯大富的“人品”有多差。文革伊始他被打成“反革命”，就是因为他对工作组不整当权派、只整相对弱势的人群不满。这在当时是有相当风险的，那时他绝不会预计到有人马上会“解放”他，可见他不是趋炎附势之徒。在文革中的罪错是“例行公事”的结果，他没有利用权力去报复私敌和看不顺眼的人。尽管他对毛“关心弱势群体”的判断不准确，但从他的行文中对弱势者状况的描述和对腐败的痛恨及对反腐措施的建议，均表明他不是粉饰太平、大唱“天天都是好日子”的无心肝的人。更难能可贵的，是这样的文字：“现在的领导人思维啊，有些不可理解，怎么就让目前这种状况维持下去呢？”“核心的东西就是怕乱，但是真的要害怕乱，就要把乱的根源解决掉。”“六·四平反的问题”，有人会操作的话，“得分会很高的”。“什么‘3·18’惨案、什么‘1·29’啊，整个加起来也没有‘六·四’杀的人多”。若不处理好的话，“在世界人民面前说不过去，北京人民记得很牢的”。读到这里，我分明看到了一个铁骨铮铮的男子汉！这种情感，这种见识，这份胆量，这种气魄，足可化解赞同我第一篇文章的朋友对他一时的误解！这也正是我写这段话的原因。

□ 摘自《共识网》

~~~~~

## 【读书笔记】

他为什么还留恋文革？

—— 读徐正全的《雪地足迹——一个文革死刑犯的人生记忆》

• 胡 平 •

一个文革中被判死刑，坐了21年牢的人，到今天仍然表示对文革很留恋。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不久前，香港的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出版了一本文革回忆录，书名叫《雪地足迹》，副标题是“一个文革死刑犯的人生记忆”。作者名叫徐正全。

1966年文革爆发时，徐正全是一个刚满20岁的普普通通的青年工人，文革中他一度成为基层造反派组织的头头，因牵涉一桩命案，他手下的一些人打死了对立派的一名成员，后来追究刑事责任，徐正全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于1968年被捕入狱，1989年才出狱。徐正全在这本书里，回顾了他参加文革的过程，写到了他的反思与忏悔。

按理说，徐正全因为文革而被判处死缓，在监狱中消耗了最美好的21年岁月，他似乎应该对文革不堪回首，深恶痛绝，但是他却说，文革那一段经历，是他“人生中唯一的亮点”，表示“虽败犹荣”，“至今不悔”。这看上去很是令人不可思议。对此，徐正全是这么解释的。

徐正全说：“我出身贫寒，初中都未毕业，一直生活在社会底层。像我这样的中国老百姓，人生平淡无奇，本无任何意义可言。正是‘文革’，使我们毫无意义的人生有了那么一点意义，让我们真正做了一回人，当了一次自己的家。虽然过程是那样令人心酸，时间又是那样短暂，我们付出的代价又是那样沉重，但这是我们人生中唯一的亮点。

我们参加‘文革’，一不为当官，二不为发财，是为了追求社会的公平与正义，虽败犹荣，赤诚之心，天地可鉴。这就是‘文革’对我、还有与我类似的人的意义，这也是我们至今不悔的原因。现如今掌握话语权的人全面否定‘文革’，连我们人生中仅有的一点意义也要剥夺。当然这也无关紧要，这个意义在我们心里，与别人的话语权无关。”

其实，对文革抱有这种态度的，并非只有徐正全一个人。

早在1994年，独立制片人吴文光拍摄过一部纪录片《革命现场》，采访了五位前中学红卫兵：徐友渔，田壮壮，黄玲，刘龙江和胡晓光。这位胡晓光，家庭出身革命烈士，北大附中高三学生，是最早的红卫兵组织之一红旗战斗小组的一位创始人。胡晓光讲起文革的那段岁月，他说那是自己四十多年的人生中“最辉煌”的时刻。他紧接着又补充道，这并不等于说那段历史是最光明的，也不表示自己当年的所作所为都是正确的。

和胡晓光类似，徐正全也不认为自己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都是正确的。比如对打死人这件事，虽然不是徐正全自己动手打死的，但是作为头头，徐正全承认，他本来是可以制止的，然而却没有制止，所以是有责任的。对此，徐正全有过深刻的忏悔。徐正全之所以留恋文革岁月，是因为那是他一生中最辉煌的时刻，是他一生中唯一的亮点；是因为文革给了他一次机会，使得他能够展现自己的个性与才华而出人头地，在政治舞台上一显身手而受到众人瞩目，从而获得平时根本不可能获得的荣耀感和成就感。

我们知道，正常状态下的极权社会无疑是一个壁垒森严、僵硬死板的社会，在那里，人们，尤其是年青人，十分缺少表现自我和发挥创造力的正当机会。人们的进取心和表现欲一概被严格地限制在当局所规定的既狭窄、又呆板的模式之中。这就造成了一种普遍的沉闷和压抑。

文革的爆发，意味着给这种压抑的青春活力提供了一个渲泄的出口。毛泽东批准了一张聂元梓七人的大字报，发表了一封致清华附中红卫兵的支持信，还亲自写下《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宣称在文革初期的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人都犯下了打击迫害革命群众的错误，号召群众起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造当权派的反，那立刻就引起了全国性的巨大骚动。

这场骚动，一方面固然是社会阶级矛盾长期积累的结果，但在更大的程度上，那更是年青人对先前那种缺乏刺激和挑战的生活而进行的一种反叛。青少年们兴奋地发现，他们从此可以摆脱日常生活的琐碎平凡而进入一种充满伟大变化的历史场景，可以不顾各级组织的层层管束而径直登上政治舞台，可以不再充当消极被动的螺丝钉而在复杂的斗争中发挥出个性和创造性。

不错，他们清楚地知道他们必须服从党中央毛主席的号命，但是，既然在过去他们还必须服从每一级地方组织的控制，那么，如今的他们可以拒绝服从各级地方组织而仅仅是服从伟大领袖，这首先会使他们获得一种自由感、解放感，而不是压迫感和束缚感。更何况他们那时还正以服从伟大领袖为原则为光荣呢。

虽然文革中的群众运动只持续了两年多。作为这场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尤其是那批革命小将，很少有人从运动中得到了什么具体的利益，有不少人还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事后也很少有人对自己往日的观点行为毫无忏悔毫无反省；但尽管如此，他们仍然对之怀抱一种特殊的兴奋感。

道理很简单，因为他们都一度登上了政治舞台的中心，进行了一场万人瞩目的有声有色的表演；不论是对是错，他们都赢得了某种承认，在历史上留下了自己的痕迹。相比起文革前和文革后的平淡人生，这段经历就显得太精彩了。这就是为什么直到今天，还有一些当年的革命小将对文革非常留恋的原因。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文革是件好事值得肯定呢？不是，当然不是。关于这一点，容我下次再谈。

如前所说，徐正全之所以留恋文革，是因为文革给了他一次机会，使得他能够展现自己的个性与才华而出人头地，在政治舞台上一显身手而受到众人瞩目，从而获得平时根本不可能获得的荣耀感和成就感。这揭示出一种深刻的人性。

按照黑格尔，人甘冒生命危险，追求纯粹的声名之战乃是人的最基本的特性。人类之间的斗争绝非只是为了生存。动物之间是生存斗争，人类不是。人不仅是为了生存而战，更是为了自由，为了荣誉，为了骄傲，为了显示自己比众人优越，有的干脆就是为了称王称霸。这种为了承认而进行的斗争每每诉诸暴力，常常充满血腥，并往往导致专制与独裁。

文革无疑是一场动乱。当我们说文革是动乱，那似乎已经表明我们对文革的否定态度，因为一般人总是不喜欢动乱，反对动乱的。一部中国古代史，充满了治世与乱世的相互交替。乍一看去，人们都是追求治世厌恶乱世的，所谓“宁为太平犬，不为乱离人”就表达了这一愿望。

但其实也不尽然。有时候，人们——至少是有些人——倒宁肯生于乱世，“使李将军遇高皇帝，万户侯何足道哉！”乱世有什么好？“乱世出英雄”。所谓治世，倒常常是压制人才，束缚个性的。先秦时期，百家争鸣，奠定了中华文明的辉煌基础，但是别忘了，那可是个相当动乱不安的时代。这些年来，反映中国古代历史的电视电影一直很受欢迎，其中大多数讲的都是乱世的故事。恰恰是乱世，才有人才辈出；恰恰是乱世，人生才精彩纷呈。

美籍日裔学者福山在他那本《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一书里，以黑格尔主义的立场，对自由民主制度提出了另外一种哲学解释。

福山认为，黑格尔对自由民主的理解，要比洛克一派更崇高更准确。福山说，按照黑格尔，人类的历史，是建立在“为了人性的尊严而斗争”的原则之上的。人类首要的追求是把人当人看。也就是说，要求别人把自己作为一个人来尊重。人之所以为人。在于他有生存的勇气，甘愿冒风险去实现自己。

这样，在历史的开端，人与他人的遭逢就导致了暴力的冲突。由于人的骄傲。由于每个人都期望得到他人的重视或曰出人头地，所以在一开始，人们并未建成一种和平的公民社会，而是陷入了你死我活的激烈斗争。后来人们才学会订立契约，在平等的基础上互相承认。这就产生了自由民主制度。自由民主制度的优越性，首先还不在于它能促进经济的发展，造就丰裕的物质生活；而在于它能保障人的尊严，保障人的自由与人权。

自由民主制度并不否认人有追求声望追求优越的冲动或曰野心雄心，事实上，自由民主制度的建立正在于给所有人追求承认的冲动提供最广阔的舞台。它利用制度设计，用野心制衡野心，用权力制衡权力。它只限制专制独裁，而它限制的目的正在于给其他的有野心有抱负的人保留机会。正是在自由民主的制度下，每个人才可能发展自我，实现自我，通过和平的竞争去赢得别人对自己的尊重。

现在我们先不妨来看看，象徐正全这类人留恋文革，他们到底留恋的是什么呢？

是留恋当时的随便抄家捆绑打人杀人吗？当然不是。

是留恋当时的侮辱人格的戴高帽坐喷气式的批斗会吗？当然也不是。

其实，他们留恋的是，在当时，他们可以写大字报，成立组织，自办媒体，挑战当权派甚至取而代之。其实，他们留恋的那些东西，恰恰都是唯有在自由民主制度下才能得到规范得到保障得到实现。文革期间的所谓四大自由和无产阶级大民主只不过是自由民主制度的假冒伪劣的山寨版而已。

因此，毫不奇怪，大部分当年的革命小将在经过深刻的反思之后，最终都接受了自由民主理念。我想，如果徐正全继续学习和思考下去，也会走上自由民主主义。

徐正全在1968年被捕，直到1989年年底才出狱。我发现，不少文革中的风云人物，至今仍留恋文革的，很多都和徐正全一样，后来曾遭受过长期的政治迫害，出狱后仍然受到严重的歧视。不错，他们在文革中犯下错误，甚至犯下罪过，但是他们后来遭到的惩罚却远远超出了他们的罪错。就此而言，他们也是政治迫害的牺牲品。

对于徐正全这类人而言，因为文革中那一段风光岁月是他们一生中最大的乃至唯一的亮点，因此不管是好是坏，他们都难免会对那一段人生格外留恋。

又因为在后来，当局在彻底否定文革的名义下，对他们实行了往往是罚不当罪的惩处，因此他们对文革中被打成走资派，文革后又复出掌权的老革命们总是耿耿于怀。

再加上后八九的中国是如此的畸形怪异，一方面是貌似资本主义的复辟和权贵私有化，另一方面又是政治上的不自由不民主，共产党的高官们俨然新阶级，打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招牌实行寡头专政。

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一点是，在相比之下最自由化的八十年代，徐正全们还在坐牢，

与世隔绝，错过了当时的思想冲击震荡和理念的推陈出新，升级换代；他们总还在用毛泽东那套理论思考，只因为那是他们唯一熟悉的理论。

以上几点，或许就是象徐正全一类人至今还留恋文革的原因。

□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网

~~~~~

## 【亡灵祭坛】

### “文革”中的几件“灭门处决”案例

• 王 锐 •

方子奋先生《南京“12·10”公判四十年祭》（见《记忆》2010年第22期，共识网上亦有载），谈到“文革”时期南京“一打三反”运动中的一次“灭门处决”事件。方先生写道：“在被绑上审判台的死刑犯中将有一对母子，他（她）将因‘现行反革命’罪同时在今天被处决”。又说：“这对母子，正是我年仅26岁的挚友李立荣，和他六十岁的母亲林舜英。”

方子奋先生就此感慨说：“古今中外数百年来，从未有过同时处决母子政治犯的案例，那一天的公判大会，给了十万观众大饱眼福的机会。也给当代历史创造了一项‘中国之最’。”

过去中国古小说和传统戏剧中，常有“满门抄斩”、“诛九族”的说法，大致指的就是这种“灭门处决”。不过，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这种“满门抄斩”、“诛九族”，也随着满清王朝的结束而退出历史舞台。没料，1949年之后，这种“灭门处决”竟然在中国大陆上，以另一种更为时髦也更为冷酷的形式复活。所以方子奋先生要发此感叹。

以笔者掌握的资料，这种被人为创造出来的“中国之最”，早在1950年代初的“大镇反”中就出现过。而且表现得更过份，更冷血。同时，在南京“12·10”公判之前，“一打三反”运动中的北京，早几个月就出现过类似的夫妻被同罪处决，父子同场被处决的“灭门处决”。

#### ◇ 北京25中教师王守亮、杨淑辰夫妇“一打三反”中被处决

以下谈“文革”中的“灭门处决”。须说明的是，这里谈的是当局以法律名义用国家机器判处并执行死刑的“灭门”，不是“文革”初期在“文革思潮”及“暴力文化”作用下的群众暴力行为的“灭门”（如北京大兴县及湖南道县那种情况）。

笔者所见的最早文革“灭门处决”，是1970年初北京市“一打三反”运动中，对北京25中教师王守亮，及其妻子杨淑辰的处决。略有不同的是，夫妇两人的处决，是一前一后相隔了两个多月。

最先被处决的是其妻子，48岁的杨淑辰。对她的处决，是在中共中央《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正式下发之前，北京市的“一打三反”运动还处于“预热期”的1970年1月27日。

笔者在《遇罗克的处决令是谁签署的》一文中，提到过的“北京市公法军管会”于1月9日发布的那份《通知》所列的20人名单，排第一位的就是这位杨淑辰（名单上遇罗克排第10，另两位著名“女性文革思想者”王佩英排第11，马正秀排第15位）。在通知正文中，还



特别提到，“现将杨淑辰第二十名罪犯的材料发给你们，……组织群众认真讨论，提出处理意见，速告市公法军管会”云云。

这份《通知》上，当局对杨的身份及所谓“罪行”之介绍，全文如下：

一、现行反革命犯杨淑辰，女，四十八岁，北京市通县人，地主出身，国民党员。其母系地主分子，被遣送原籍。

杨犯顽固坚持反动立场，对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怀有刻骨仇恨。杨犯于一九六六年充当外国特务，大肆盗窃我国机密情报，书写反动文章，并领取了大量特务活动经费。仅一九六七年三月杨犯出卖情报数百份，同年四月向外国驻华使馆人员递交情报时，当场被我抓获。

看来，当局将杨身份定为“外国特务”，“罪行”是“向外国驻华使馆人员”“出卖情报”。笔者曾在《遇》文中对此表示质疑。理由是杨一个无业无职的普通中年妇女（当时尚不知其夫是普通中学教师），根本没有任何可能，在一月内（1967年3月）窃取数百份“我国机密情报”并完成出卖。其时，全球尚无电子文本，任何情报都是纸文本。机密材料一般数十页或几十页，几百份材料须装几大箱。要在一个月之内窃得数百份机密文件并完成递交转手，以一个人之力，笔者认为世界上最有名的美国中情局或苏联“克格勃”的超级特工，也不可能做到。何况乎如杨这样的一介无职无权、无特殊背景的普通妇女？她从哪个途径或渠道，能一月内窃取几百份“机密情报”？

因此，笔者在文中推断，这位杨淑辰出卖给“外国驻华使馆人员”的所谓“机密情报”，不过是当时北京街头随处可见的文革小报，传单和其他文革资料之类。杨贪利收集来，向驻华使馆人员售卖并因此被捕。“一打三反”运动正式开始前，北京市奉命为全国树“样板”，杨也作为“反革命犯”典型，被定性为“外国特务”惨遭处决。

1970年1月27日，这位杨淑辰与材料上除遇罗克之外的19人（包括王佩英、马正秀），在北京当局10万公审大会后被处决。

本文完稿时，从《记忆》上读到周七月先生文章，证实了笔者推断。当年与遇罗克一起被处决的19人中，有一对情人。他们是北京挑花厂的医生田树云和医士孙秀珍。2月11日《通知》上给的罪名是：“窃取我大量重要情报，先后在国际俱乐部，友谊商店等处，将反革命信和情报投入外国驻华使馆汽车内十九次”云云。周七月狱中与田，孙相识，与田尤熟。周在所著《四十年前的死刑回忆》（《记忆》2011年1期）中说：“以他们的职务和社会地位，不可能接触到罪状名单上公布的所谓窃取我大量重要情报。”又说：“据田树云说，他们投递到某些社会主义国家驻华使馆汽车里的仅仅是社会上公开卖的红卫兵报和首长讲话之类。”杨淑辰卖的所谓“情报”，应是此类。

这次处决之后，北京市公法军管会3月5日再开公审公判，处决了遇罗克、顾文选等19人。之后的3月24日，北京市公法军管会发出了当年的第三份类似《通知》。让人没料到的是，这份《通知》中，杨淑辰的丈夫，北京市第25中教师王守亮也赫然“榜上有名”。

北京市第25中，虽不如高干子弟云集的101中学，北京4中有名，但“文革”中也风光过一回。1967年7月，北京25中高三学生“曲折”（上山下乡时改的名字），向全国学生发出创办“红卫兵大学”的“倡议书”。两天内，北京有300多人报名。正式“上山下乡”时，仅剩10余人。被当局安排到内蒙古锡林格勒草原落户。当年10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专门文章，赞扬此次“革命行动”。第二年底，《人民日报》传达了毛泽东关于“知识青年

到农村去”的指示。全国掀起了大规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知青运动”即由此而来。所以，有些史家将北京第25中，称为“上山下乡运动”的“策源地”。

这份《通知》中，对王守亮身份及“罪行”的介绍，几乎就是其妻杨淑辰“罪行”的翻版，甚至原文照抄——

五、现行反革命犯王守亮，男，四十七岁，山东省人，地主出身，系蒋匪军上尉军官、国民党党员，原北京二十五中教员。

王犯自一九六六年以来，伙同其妻杨淑辰（外国特务，已处决），大肆盗窃、出卖我国机密情报，书写反动文章，仅一九六七年三月，王犯就伙同其妻出卖我国重要情报数百份，并领取了大量特务活动经费。

看来，当局认为仅仅将杨淑辰处决，似乎还不够，还未能充分显示所谓“无产阶级专政的威力”。于是这次将其丈夫王守亮株连治罪。而且，特别在简介中注明，其妻杨淑辰系“外国特务，已处决”字样，表明了这种株连治罪，而且必须“重罪施重刑”的意图。

笔者收藏的这份经某位权势人物批注过的《通知》原件上，这位王守亮所谓“罪行简介”后，被黑笔批有“死。”字样，表明将之正式列入下一批处决名单。

由此，可以认定，这位北京市25中教师，与“北大才子”沈元等，于一九七〇年四月十八日北京市当年第三次集体处决行动被处决。离其妻杨淑辰处决，相距两个月零二十一天。当局至此完成了“夫妻灭门”之举。

也不知这位北京中学教师王守亮、杨淑辰夫妇有无子女？子女其后遭遇、经历如何？王、杨夫妻两人此案“文革”后是否得到“平反”？深望知情者提供相关信息。

#### ◇ 侯坤、侯建民父子同一天被处决

北京市“一打三反”运动中的另一起“灭门处决”，是北京通县的侯坤、侯建民父子两人，于一九七〇年三月五日被同时处决。

北京市公法军管会于一九七〇年二月十一日发出的当年第二份类似《通知》中，有其父子二人的情况及“罪行简介”。全文照录：

九、现行反革命杀人犯侯坤，男，五十二岁，北京市通县人，系反动资本家。

现行反革命杀人犯侯建民（侯坤之子），男，二十三岁，北京市通县人。

反革命杀人犯侯坤顽固坚持反动立场，抗拒社会主义改造，长期在其家埋藏铅二千余斤，并散布反动言论，向其子女灌输反动思想。侯犯为对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唆使其子，反革命杀人犯侯建民于一九六八年五月六日夜，将其家中八口人全部砍杀和威逼跳井、跳水坑致死。

笔者认为，侯坤、侯建民这个案例，应算是“文革”中的一个典型案例，有双重研讨价值。

所说“双重研讨价值”，一是说其作为北京市“一打三反”运动中，父子同天同场被处决的“灭门处决”案例。二是侯氏父子杀人“罪行”，发生在一九六八年五月，而且所杀及所逼其自

杀者，均为自己家人。

其时正是当局搞的“清队”运动大规模开展之际。所谓“清队”，就是“清理阶级队伍”。对每个人的出身，经历，进行全面清理审查。各地开展运动后，搞得极为惨烈，极为恐怖。全国许多知名人士，都是在这场“清队运动”中自杀身亡的，甚至夫妻自杀，全家自杀。

查出身资本家的侯坤，是迫于“清队”运动的恐惧，况且，又被抄出“长期在其家埋藏铅二千余斤”的“罪证”，不惜让全家人集体赴死的。

此案由此也成为了研究“清队”运动中，被清对象决心“自我寻死”，作为全家人最后“出路”的典型案列。侯坤是资本家，也算有知有识阶层，身上肯定有古代士大夫阶层那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心理和意识。

其家躲过了“文革”初期的群众暴力，却躲不过其后的“清队”。当然，更躲不过再其后的“一打三反”。显然，侯氏父子，在杀了家人（或逼家人投井跳水坑自杀）之后，其两人也是打算身死的。

但不知何种因素影响，父子两人未及自杀，或相互杀死，以致被捕。但在狱中足足关押了近两年，才被当局在“一打三反”中拉出来同时处决。

笔者保存的那份2月11日《通知》，亦是被权势人物批注过的原始文本，侯坤、侯建民父子“罪行简介”之后，黑笔批有“死刑”二字。在姓名之前，亦被红笔划了“√”记号，表明为被处决之列。

1970年3月5日，侯坤、侯建民父子，与遇罗克、顾文选等人一起被当局处决于同一个刑场。

#### ◇ 马正秀：另一种形式的“灭门处决”

马正秀1931年出生，原籍重庆市，是北京自然博物馆讲解员，一位有独立意识的知识女性。其丈夫赵光远，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也是著名作家艾芜的学生。

艾芜先生在一篇文章中回忆说，赵光远在1940年代是他当年在重庆育才学校的学生，中共地下党员。曾听过艾芜在“社会大学”讲文学课，并在重庆《大公报》上艾老主编的《半月文艺》上发表过散文。1950年代初赵参加志愿军，赴朝作战。因病退伍后，是艾芜帮他在北京找到工作，即进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在戏剧编辑室任编辑。1960年代初，赵曾担任过在全国影响甚大的剧作家孟超剧本《李慧娘》的责任编辑。

马正秀在“文革”中因反对乱批乱斗，反对打倒一批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反对打倒共和国主席，于1967年9月16日被捕，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在狱中马正秀也始终拒绝认罪。由此，在北京市“一打三反”运动正拟拉开帷幕时，其与遇罗克、王佩英等“文革思想者”一起，上了北京市公法军管会1970年1月9日《通知》所附的20人名单。该《通知》对马正秀的介绍如下：

十五、现行反革命犯马正秀，女，三十八岁，四川省人，商人出身，学生成份，北京自然博物馆讲解员。其父系历史反革命分子，其长兄系军统特务被我镇压。

马犯思想反动透顶，刻骨仇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经常散布大量反动言论。一九六七年八、九月间，马犯多次书写和公开张贴反革命标语、传单，恶毒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穷凶极恶地污蔑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马犯在押期间，仍疯狂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反革命气焰嚣张至极。

这份名单上的20人，都是当局内定的“处决犯”，《通知》发出后仅10多天的1970年1月27日，除遇罗克一人因故暂时“刀下留人”外，马正秀随18人一起被处决。

从《通知》上的文字介绍看，马正秀的亲哥已于1950年代初的“大镇反”中被处决。尤为值得一提的是，马正秀的丈夫赵光远，已于一年前的“清队”运动中，在所谓“工宣队”进驻人民文学出版社时，于1969年3月15日，因妻子马正秀被捕及所谓“社会关系复杂”，遭到审查拘押。不堪压力，从四楼上，跳楼自杀身亡。如今作为妻子的马正秀，又惨遭处决。由此，笔者认为赵光远、马正秀夫妇遭遇的，是另一种形式的“灭门处决”。

也不知赵、马夫妇有无子女？马正秀被处决后其子女遭遇如何？老作家艾芜“文革”后曾著文《夜深我走在北京的街头》，深情缅怀追忆这对年轻的“文革遇难者”，感叹他们遭遇的不幸。

1980年2月28日，北京市公安局对马正秀一案于做了改判。1981年秋，重庆市与北京市公安局在重庆殡仪馆联合举行马正秀追悼会，为其彻底平反。

著名诗人屠岸，曾是马正秀丈夫赵光远的同事和好友，两家有10余年的交往。屠岸先生于2000年末发表长诗《迟到的颂歌》，这首68行的长诗，全诗就是献给马正秀的。其中有这样的诗句：“三十年前一个凛冽的寒夜里 / 罪恶的枪声响了，她倒在血泊中！”“啊，布鲁诺、张志新式的女英雄，让我用歌声伴你到永久，马正秀！”

笔者拙作《遇罗克的处决令是谁签署的》，其中就谈及马正秀及丈夫赵光远。该文后来被有些人的博客转载，并有网友留言。其中，有位网友留言说：

博主提到的赵光远我见过。文革前两年我刚上小学，放寒暑假时经常随家长到出版社去。当时象我一样情况的小孩有几个，大人在办公室工作，小孩们就在楼道里玩，或者跑到楼下大院里去捉迷藏。其中有一个小女孩就是赵光远的女儿，她比我小一两岁，很会讲话，胆子也比一般小姑娘大。我对她爸爸印象较深，个子不是很高，眼睛亮亮的，有些谢顶，面颊骨微突，讲一口南方话。文革后某一天听父母讲赵光远跳楼自杀了，也听说他妻子是现行反革命被抓起来了，而他们的女儿（忘了名字）后来据说是被她姑姑接走。今天才知道马正秀的名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一九七零年三月五日工体遇罗克等人的宣判会我也在场，目睹了那最后的一刻，当巨大的灾难降临时他们挺身面对，他们才是我们中华民族真正的脊梁！

很荣幸能为此补充，这也是对他们真诚的纪念。

◇ “大镇反”中一家三口跪成一排被处决

应当说，共和国历史上最典型的“灭门处决”，发生在1950年初的上海市。笔者在关注“文革”的同时，也在关注共和国的历次“镇反”运动这个课题（其中包括“文革镇反”），力尽所能收集相关资料。其中就收集有这次“灭门处决”的资料。

这次“灭门处决”，被处决者是父陈小毛、母张金庭及其子陈磊一家两代三口。时间是19

51年4月30日，地点是上海市郊某刑场。

临刑前的照片显示，夫、妻、子三人被反缚双手，从左到右跪成一排，头顶上高插着特大的写着其“罪名”的“死刑标”。当局给出的罪名分别是：父陈小毛，“特务、汉奸、恶霸”；妻张金庭，“特务帮凶”；子陈磊，“特务、汉奸”。（见《上海公安画报》第2期）

其实，这陈家两代三口，仅是当天全上海被处决的285“反革命分子”中的三人而已（另有资料说上海市当天处决数为294人——《建国以来大事纪实》第94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5月）。1951年4月30日，（上海）“市军管会军法处将判处死刑的285名反革命分子押赴刑场执行枪决”。此前两天的4月27日深夜12时（实为28日凌晨），在“上海市镇压反革命行动总指挥部”统一指挥下，上海当局出动3.5万名军警、干部，及工农、学生组成4445个行动小组，实行全市性大逮捕（捕人数不详）。两天后即有这次“大处决”。从被捕到处决，其间仅两天（有的甚至不到两天），可见未经认真证据收集及审判，几乎是即捕即杀。

“二战”后非战争状态下的和平时期，一个城市一天处决285人（或294人），不知是否是创造了一个方子奋先生所说的“中国之最”，或者说是“世界之最”？此前，人民共和国的“处决纪录”是一个月前的3月5日，北京市处决199人。3月29日，天津市处决193人（《建国以来大事纪实》第93页、94页）。“上海纪录”出来后，北京市又于5月20日至22日，三天分批处决221人。不过，仍未能赶超“上海纪录”。

关于上海“镇反”成果，资料显示，仅高潮期“自1950年10月中央下达‘双十指示’至1951年10月，一年间，（上海）全市共逮捕反革命分子25100余名，其中依法被判决死刑2546名”。（以上见山西《党史文汇》1997年第8期）。

大概为了显示“镇反”对社会的震慑力，在死刑执行前几分钟，将这一家三口单独跪成一排，给照了一张照片，而且是“特写镜头”。然后发表在《上海公安画报》上，对社会公布。

笔者曾多次审视这张照片。惊奇发现，被即将处决的父母子三人，竟然表情相当平静沉稳。既没有通常所见临死前的激烈挣扎甚至反抗，或大喊大叫，也没有被吓得半死，缩成一团。三人都是直起腰跪在那里。尤其是父亲陈小毛，那脸色之平静，超乎想象。只有妻子张金庭神色阴郁，多少有点怒目而视的样子（也许她平时就是这神情）。儿子陈磊大概20多岁，眼神多少有些茫然，身上穿的竟然是当时的“干部服”（可能被捕时即如此装束）。一家三口平静沉稳接受处决来临，大概是以为全家人命中注定该“遭此一劫”，应当坦然面对。

最后，还须多说几句的是，中国历代的“灭门”，大都是杀男不杀女。被株对象，是年满一定年岁的男丁，而家族中的女人，是设为“家奴”，或发配充军边塞之类。人民共和国的“灭门处决”，却是男女一起杀。不管是夫妻，还是母子，只要定性为“反革命”，一律株杀。

审视从“大镇反”到“文革”时期的这种“灭门处决”，当局的意图是清楚的，就是给全社会和民众造成震慑及恐惧感。它传递的信息就是：只要你敢反对（不管是行动反动，还是仅仅是语言或文字反对），我就敢杀你全家！

笔者在《周恩来与“一打三反”运动》一文中，谈到一直被当局尘封了几十年的一桩史事，毛泽东批“一打三反”中的周恩来说：“我们不是靠杀人来统治。”其实，从“大镇反”和“文革”对所谓“反革命”的各类处决事实来看，自他本人为首建立政权，一直以来，到“文革”时期，实在都是“靠杀人来统治”（当然还借助范围和强度更大的“劳改”和“劳教”）。

2010年12月18日于自贡危楼书屋

☐ 原载《共识网》

---

|                       |             |          |
|-----------------------|-------------|----------|
| 本期编辑：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CND》总编： |
| 华新民（美国）               | 思语（美国）      | 陈天寒（美国）  |
|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             |          |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